

名家学术著作

◎ 陈学文 著

徽商与徽学



徽学是我国地域性三大显学（藏学、敦煌学）之一，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演绎和深化。徽商是徽学的重心，为国内外学界所瞩目的研究课题。深入研究徽学、徽商对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完善市场机制，在理论和现实方面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方志出版社

本书由浙江...
社会科学...
著作出版...
基金资助...
出版

版式设计：天目视界



《激商与激学》是一部专题研究学术论著，是作者长期研究的成果。

ISBN 7-80122-931-2




9 787801 229311 >

ISBN 7-80122-931-2/K·533

定价：32.00 元

徽商与徽学

◎ 陈学文 著



□ 方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徽商与徽学/陈学文著. —北京:方志出版社,2003.4
ISBN 7-80122-931-2

I. 徽… II. 陈… III. 文化史—研究—徽州地区—明
清时代 IV. K29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0549 号

徽商与徽学

著 者:陈学文
责任编辑:王 熹

出版发行:方志出版社
(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5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楼12层)
邮 编 100732
网 址 <http://www.fzph.org>
邮 箱 zbsh@fzph.org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萧山日报印刷厂

开 本:1000×1400毫米 1/32开
印 张:6.8125
字 数:230千字
版 次:2003年4月第1版 200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0001—1000册

ISBN 7-80122-931-2/K·533

定价:32.00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序 一

张立文

人生苦短，譬如朝露。或对酒当歌，或终日乾乾；或灯红酒绿，或自强不息；或得鱼忘筌，或德才兼备。当今世界，人生价值的选择，可谓多种多样。特别在利益与道义的冲突中，利益趋动成为强势的情境下，陈学文研究员数十年来甘于寂寞，淡泊名利，对徽学研究孜孜以求，焚膏继晷。或探赜于浩大的徽学文献的宝库中，或索隐于徽文化生命智慧的海洋里，而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不仅获得学术界同仁的一致赞誉和好评，而且蜚声海内外，这是对他长期艰苦钻研、冥冥独造的应有回报。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文兄的人生价值得到了实现。虽人生价值实现的方式，人人有异，但学文兄的实现方式，在社会上将获得众多人的认同。这种认同，随着时空的大化流行，将会获得更多人的赞许。“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相信学文兄还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最近学文兄的《徽商与徽学》一书完成付梓，要我写序；我自己称量自己，我对徽商确无研究，仅对新安理学中的朱熹和戴震有所探索，著成《朱熹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是1949年以后第一本系统的朱熹思想研究的专著），及《戴震》（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1年版），这就是说我仅对徽学中一个方面中的一个层面有所涉及，但为学文兄的《徽商与徽学》撰序，就有力不从心之感，好得学文兄在来函中认为，“序本无一定格局，尽可以自然，真实为上”。于是我才敢于应命。

学文兄与我有50多年的学缘和友缘。就学缘而言，一者我们50多年前都就读于温州瓯海中学。1950年我被当时革命洪流所激荡，参加革命工作，瓯海中学的十多位男同学与永中的女同学被分配到最艰苦的大

山区泰顺县参加土改工作。他亦于1951年由组织抽调到青年团温州市委工作。二者他于1953年考取山东大学历史系,我于1956年考取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中国革命史专业,可谓是同一专业。就友缘而言,在大学期间不仅互通消息,而且在寒暑期回温州时,亦能聚会。1957年他山大毕业分配到天津工作,我们又在北京畅谈。此后几十年来从未间断过通讯。对他的为人为学,我是较了解的。

基于此,学文兄命我作序,我是不能推辞的;再者我作为教育部重点基地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的学术委员会委员,也应为推进徽学研究尽一点绵薄之力。现按照学文兄的“以自然,真实为上”的旨意,讲一点我对徽学研究的想法。我曾在《光明日报》(2000年9月12日)发表过一篇《徽学的界定及其研究方法》的短文,在文中我认为,“所谓徽学是指以徽州社会、经济、文化、思想、艺术、科技、工艺等为研究对象的、具有徽州特色的一种理念和学说的总和”。这个界说,只是我个人的体认。

当前徽学研究,我认为应处理好这样几个方面的关系:一是古今的接续性。“古”是指传统层面的,包括文本(文献)的遗留,古民居、建筑的遗存,风俗习惯的孑遗,这些都是呈现的、有形可见的;也应包括隐藏、不在场的精神文化层面,它体现在在场的、有形可见之中。前者可以开发和转换为现代文化产业、旅游景观等,可获得直接的经济效益;但不应忽视后者的发掘和转生,如渗透在文本、有形事物中的精神文化,使徽学的精神文化在现代的转生中提供有益的贡献。因为今是古的接续,古是今的源头活水。至于如何转生,我在《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中已有详论,这里不赘。

二是中外的会通性。徽学的研究必须有全球文化的视野,中华文明的高度,来统摄徽学。徽学不能局限于东亚,而应走向世界。要走向世界必须加强学术交流,使世界了解中国,使世界了解徽学,只有了解徽学社会文化、精神的价值和意义,才会促使国外的汉学家去探讨研究。在目前阶段,除高层次的学术交流、国际研讨会外,需要与黄山旅游开发相结合,使黄山成为文化旅游的典范,而文化旅游的核心内涵就是徽学旅游,使徽

学得以普及,通过各种形式的景观,向国内外游人展示徽学的独特魅力。因此,要建构徽学综合博物馆,作为黄山文化旅游的重要内容之一,以提高黄山文化旅游品位和档次。这是徽学向国人和世界的一种普及工作,也是提高徽学世界知名度的有效方法。在这种情况下,便会有更多国外学者来研究徽学,徽学也可以由此走向世界。

三是时空的动态性。徽学有其产生的时间,也有其一定的地域空间。但时间是三维的,有其过去、现在和未来,就徽学而言有其发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因此,徽学不能机械地以徽州所谓的起始作为徽学发生的起始。若以宋宣和三年(1121)改歙州为徽州为起始,那么,原有歙州文化的积累算不算徽学,作为“程朱阙里”的二程便出生于1032、1033年。今天我们以现代的观念诠释徽学,促使徽学的繁荣发展,也为徽学的未来显露兆头。就徽学空间而言,有所谓“小徽州”的一府六县说,有所谓“大徽州”说。其实徽学具有地域的辐射性,它随着徽州人口的流动、聚居状况和经商活动等,徽学的文化精神也被带到全国各地,这种徽学的传播,也是徽学的一个方面。其实徽学是一种称谓,是一种符号,它本身是大化流行,变动不居的,把一种动态性东西凝固化,并不有利于徽学的研究和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冲决地域性的局限和徽州人与非徽州人的狭隘观念,只要在历史上或现代国内外学者,对徽州的研究、传播、弘扬做出贡献的人,都属于当代或未来徽学研究的对象,这样才能使徽学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得以发展。

四是美丑的不居性。在文化的研究中,特别是传统文化研究中,人们往往先加以定性,就像小孩子看戏,先问那个是好人或坏人。研究徽学也要先给徽学定性,戴一顶“封建文化”的帽子才踏实。这种价值判断,可以随着日月的流逝,价值观念的变异,研究方法的转换,而作出截然相反的判断或较符合本真的评价。关于这方面问题,在拙著《和合哲学论》的《和合价值哲学》中已有详论,故不赘。各个民族文化、各地域性文化,都不能以好坏、美丑来判断,其实各民族文化、各地域文化的发生、发展,就有其文化自身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它既适应了一定时空,即民族性、地域性的

需要,也给予一定民族和地域以文化的诉求。然而,文化霸权主义者和庸俗文化进化论者,往往以制造文化的优劣论、文化美丑论、文化好坏论,作为消灭异文化、异民族的借口或幌子。徽学的研究切忌陷入美丑价值评价的俗套,而有碍于对徽学本真的探讨。凡是适合于社会需要的文化,有益于社会、文化发展的和提高民族、人民文化道德素质的文化,都是好的、美的文化。

五是分合的圆融性。从中华民族文化的视野来看,可分为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长江流域的吴楚文化(包括河姆渡文化)、四川一带三星堆文化、东北一带的红山文化等等,而和合为中华文化。就宋以来而言,可分为濂学、洛学、关学、涑学、闽学、湖湘学、永康学、永嘉学以及徽学、阳明学等等,它们都有文献和文化遗存,又和合为更高层次的新的文化形态。其文献和文化遗存只是多寡之别,而非“学”与“非学”之分。徽学是在中华大文化氛围中,在各学派文化的冲突融合中发生、发展,离开中华大文化氛围及各学派的互动融合,亦不可能有徽学的成就。因此,对徽学与其他“学”的研究,应有一种平等的心态,进行平等的对话。只有对各学的思想有同情的理解,才能对徽学的历史地位、作用、影响做出公正的、客观的、合理的评价。徽学决不是一枝独秀。红花还需要绿叶配,这里是从互动关系而言,而非以主次论红花与绿叶。

当前,徽学研究需要正确体认古今、中外、时空、美丑、分合此五大关系,融突处理此五大关系的接续性、会通性、动态性、不居性和圆融性。这样,我们的研究才可能在冷静的、理性的、智慧的意境中进行,才能推进徽学的深入发展,开发徽学的现代生命智慧,这是历史赋予徽学研究的慧命。

确实,徽学研究还处在刚起步阶段,在这个阶段若有正确理念和方法,徽学研究就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徽学研究虽年青,但有些研究成果是超前的。学文兄的《徽商与徽学》从一个层面说是超前的、成就的著作,是他近50年来心血的结晶。本书探赜索隐,钩深致远,纵横比较,创见迭出。其话题之鲜活,内容之充实,取材之精详,功底之扎实,为徽学研究树

立了一种范式,也为徽学研究作出了贡献。其书付梓之际,谨贺其成。
是为序。

2002年7月2日,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张立文,1935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孔子研究院院长,中国文化与经济发展研究所所长。著有《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朱熹思想研究》、《戴震》等20多部论著。

序 二

(日本) 白井 佐知子

陈学文教授多年来一直从事明清史和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尤重商业史及商品经济史的研究,著述颇丰。其论著为日本的所有中国历史学者尤其是明清史学者的必读之书。他作为首屈一指的明清史专家而受到日本学者的广泛尊重。笔者从学生时代起便拜读陈教授的著作,其后在研究徽商的过程中又蒙教授多方指教。值此《徽商与徽学》出版之际,受命作序,甚感荣幸。

20世纪中叶以来,日本明清史研究的中心集中到长江下游区域的社会经济史方面。其主要缘由是这一带曾为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同时该地区的历史资料相当丰富。笔者当初曾将清代长江下游社会经济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可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在长江下游发挥重要作用及影响的官僚、士绅和商人中多为徽商后裔或与徽商有关,遂开始对徽商的研究。

正如“无徽不成镇”所言,徽商研究绝非仅限于对徽州地区的研究,如果避开徽商不但是长江下游,就是明清时代经济史的研究也将无法进行。江浙对徽商研究而言也是极为重要的地域。研究徽商便须认真探索他们居住或侨居的地方,追寻他们的生活轨迹。而陈教授在这方面的研究一直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

笔者在1991年夏季中国举行的“国际明史学术讨论会”上有幸与陈教授结识。同年冬季又往杭州滞留了两周。期间除资料收集、参观塘栖镇、参加杭州徽州学研究会等与学术有关的活动外,住宿等事宜也均仰仗陈教授予以了妥善的安排。杭州徽州学研究会成员多数是徽州籍或其后裔,可陈教授虽非徽州出身,却作为徽学研究专家成为该会的重要学术带

头人,并为大家所推崇。在杭州期间得以与陈教授有较长时间的接触,使笔者受益非浅。陈教授虽为著名学者,业绩与年龄均高出笔者许多,却坦诚以同学相待并多有教诲。他作为一名真正的历史学家,不断开拓新的领域以及对后学平易近人的态度堪称楷模。

《徽商与徽学》实为陈教授关于徽商研究集大成的著作。与以往的徽商研究相比,具有以下特点:首先以江南特别是浙江的经济为视点的内容非常丰富;同时又将《明清时期商业书及商人书之研究》中所论述的关于商业书及商人书研究的成果、以及最近所从事的有关胡适研究的成果大量融入。由于陈学文教授的研究极其注重精心收集资料并予以严密验证的准确性,所以其卓越的学术价值才能不因时代的变迁而有丝毫丧失。

白井佐知子

2002年9月20日于日本东京

白井佐知子,女,1949年生。东京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博士课程修了。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序 三

(韩国) 朴元焄

得悉陈学文先生即将出版另一部大著《徽商与徽学》我非常高兴。后学才疏学浅,为陈先生大著献上序文,难免有缩手缩脚的感觉。我记得,1996年7月第一次见到陈先生。当时,我在访问杭州大学,经黄时鉴教授的帮助,相识陈先生,听到高见。翌年10月,我准备考察浙江省淳安县,到杭州联系陈先生。陈先生告诉我,现正在开杭州徽州学研究会,劝我参会,我参加一天的会,与陈先生第二次晤面。其后,我有几次机会在中国学术会议上见到陈先生,并常有书信往来,多蒙指教。

现在我的研究室书架上排有陈先生五部著作:《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1989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台北稻乡出版公司)、《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1993,群言出版社)、《明清时期商业书及商人书之研究》(1997,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2000,浙江人民出版社)。从书名就不难知道陈先生尽力而为的一生研究领域。陈先生在明清时期商品经济、江南市镇、市场网络等领域作出很多研究成果,尤其是韩国明清史研究者对陈先生研究商品流通的成果也非常熟悉,他的成果在韩国已广为传布。李允硕先生曾对《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和《明清时期商业书及商人书之研究》写过书评(各发表于《明清史研究》第4辑,汉城,1995;和同期刊第10辑,1999),最近曹永宪先生对《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发表书评(同期刊第16辑,2002)。

我接触陈先生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论徽州商业资本的形成及其特色》(《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续编〉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此文原先是登载于《安徽史学

通讯》第5期(1958年),经修改后成为《讨论集》的文章之一。后来,我在高丽大学与研究生以徽州商人为主题进行讨论课时,阅读并讨论过《徽商研究论文集》(江淮论坛编辑部,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里的同一篇文章。但是,到那时候我也根本不知道文章的作者陈野就是陈学文先生,只是对陈野为何不发表后续研究论著多少有过疑问。过后,我才得知,陈野就是陈学文先生初期著作的笔名,并且得悉1957年陈先生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之后,一段时期注重研究徽州商人。如今陈先生年近古稀,在有关明清时代江南商品经济和商品流通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回到第一个研究领域徽州商人,即将出版《徽商与徽学》,我们不难想象陈先生对此必会感慨万端。

从《徽商与徽学》的目录来看,我们就知道第一章《徽州商业资本的形成及其特色》是上面所提到的陈先生初期论文。第二章《徽商对明清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和意义》是以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所发表过的有关徽商的三篇论文为中心的。第三章《徽商与社会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虽难免与《明清时期商业书及商人书之研究》有一些重复,但弥补以往研究的空白——如徽商的商业书编撰,在这方面作出了不少贡献。第四章《徽学研究》,值得注意,以不是现代徽州学而是前近代徽州学术为研究课题。第五章《徽商的比较研究》,是徽商与其他商帮之间的比较研究。陈先生早在《中国十大商帮》(张海鹏、张海瀛主编,黄山书社,1993)里写过龙游商帮,可知本章以当时的文章为中心,作龙游商帮与徽商的比较。

陈先生才德兼备,刻苦勤励。对先生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果,我作为海外后学,望尘莫及,钦佩景仰不已。

盼望《徽商与徽学》近期出版。

朴元焯谨识,2000年8月26日于韩国汉城

朴元焯,1944年生,现任韩国高丽大学校东洋史学科教授,历任韩国东洋史学会会长。著有《明末清初社会的再照明》(合著)、《明初朝鲜关系史研究》、《明清徽州宗族史研究》等。

自序

我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商业资本时，曾选择徽州作为一个典型，企图来研讨中国封建晚期的商业资本。初步研究认为中国商业资本并非是完全找不到投资方向而要绝对返回土地，与土地资本或高利贷资本结合，而已有独立发展趋势。徽州商人资本由于投资环境的改变，投资空间扩大，可以投向矿冶或手工业，开始向产业资本倾斜，进而开始与产业资本结合。这是一条广阔而有生命力的道路，值得重视。而传统观点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商业资本只有与土地资本、高利贷资本三者的强固结合。后来数十年我时断时续对徽州手工业、徽州历史、徽州社会与宗族制、徽州土地契约文书、徽州民俗、徽商、徽州文化(含徽州商业书商人书)、徽州历史人物，徽学诸领域作些个案性研究，写了一些研究论文或文章。

徽州文化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的：“如此灿烂的文化，如此博大精深的文化，一定要世代传下去，让它永远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对于徽州文化，决不是任何一个人在短时间内所能完成的巨大科学研究工程，而需要多学科多种人联合经长时期的积累和努力，才能打开它的宝藏，为我中华文化发扬光大，使它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张立文教授指出：“需要正确体认古今、中外、时空、美丑、分合此五大关系，融突处理此五大关系的接续性、会通性、动态性、不居性和圆融性。”(参见本书张序)此已非吾辈之所能完成也，期待着新一代徽学研究者承担起艰巨又光荣的任务，结出丰硕的成果！

徽学是我早期研究的一个领域，后来由于工作环境和任务的变动，我逐渐转到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商业、商人、市场、市场经济萌芽、城市化(含城市史、市镇史)、中外关系史(含海交史、华侨史)、区域文化史、明清史、历史人物、方志学、商书诸领域的研究，而放弃了曾经发生兴趣的

唐宋史、太平天国史等研究(只发表数篇论文)。回顾这数十年的学术生涯,徽学是我早年研究中颇具吸引力的领域。已故著名历史学家傅衣凌教授曾勉励我:“努力于明清两代徽州商人、江南市镇、海外贸易诸方面的研究,颇有心得,实属难能可贵。”(《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序)但是重操旧业为时已晚,岁月无情,将步入暮年,精力已不济焉。所以先把多年徽学研究成果作一汇编,公诸于世,奉献于徽学研究者面前,亦以此来纪念自己这一段可以怀恋的学术生涯!期待着专家学者读者的批评。希望后来者居上,共同为这一繁花似锦的花园增添一花一草,我心则已足焉!

2002年7月20日于望天庐

前 言

我与徽学

我与徽学结下不解之缘已有 40 多年了,但是从研究来说则是时断时续,少有成绩,十分惭愧。

回想在 50 年代,我刚从大学毕业分配到天津工作,对我最有吸引力的不是海河、水上公园、渤海大楼、劝业场等景点商场,却是颇具规模的天津图书馆。工作之暇,整天沉在图书馆里读书。大学虽然毕业了,学而知困,觉得自己还很不够,必须不断充实、丰富自己的知识。有时早出晚归,夜以继日,中午仅买几个馒头充饥。这样勤奋的热情终于感动了图书管理员,凡是我所要看的,不管是善珍孤本书,或是镇库之宝,他都会尽量满足,如《万历起居注》就是那时读的。可惜我已忘了他的姓名,只记得是一位脸孔红红年过 50 多岁者,我真是应该谢谢他。也就是在图书馆近一年多,我写出并发表了《论两税法实施的背景和意义》^①、《明代倭寇事件性质的探讨》^②、《试论郑和下西洋的性质》^③、《明清时代佛山经济的初步研究》^④和电影文学剧本《乘风破浪》等,这正是我初出茅庐最富精力的青春年华,也是很可怀念的岁月。我一边研读古文献,一边研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历史学论著,发现当时流行的中国古代商业资本、土地资本、高利贷资本三者结合的理论模式不尽然,因为到了明代国内大小市场的形成和存在,商业资本并不是完全找不到出路而只有投资土地成为土地资本的一条路。某些地区已有离开土地走向矿业开发和手工业经营,最具典

① 《史学月刊》1958 年第 7 期。

② 《江海学刊》1958 年第 7 期。

③ 厦门大学学报《论坛》1959 年第 1 期。

④ 《理论与实践》1959 年第 8 期。

型的是明代徽州商业资本,个别的已经离开土地,参与远程商品流通,也有一些商人积累财富后转向开矿、经营手工业的个案,于是就写了《论徽州商业资本的形成及其特色》^①,也就是这篇徽学论文把我引入了徽学研究的领域。1960年南京大学历史系主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续编)^②,将此文收入其中,并在《前言》中指出:“若干科学工作者对明清时期商业资本的发展情况,以及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问题,进行了综合的研究,并且有某一地区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发展进行重点探讨的,这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成绩。”说起这篇论文有意思的是1979年,傅衣凌先生发起召开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术讨论会,我应邀参加,在第一天讨论会上,叶显恩先生就徽州商业资本、佃仆制作了专题发言,傅先生就指名我第一个发言。会后同住一室的叶先生很兴奋,问起我对徽学研究的经历,我说在1958年曾写过一文,但用陈野笔名发表,叶先生一下子跑过来与我拥抱。他说我在徽州和安徽到处找过您,不料竟会不期而遇,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辛弃疾词)。真太高兴了!从此我与叶先生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85年刘森先生主编《徽商研究论文集》^③,他来信要收此文,我说是早年旧作,写得不够成熟,不一定收入。他却戏言:陈祭酒的文章非收不可。1983年美国学者宋汉理博士来华访问,她在徽州实地考察后专程来杭与我讨论徽学(同时访问过傅衣凌、洪焕椿二位先生)一周。她说她在加州大学写作博士论文曾参考过此文。她在《〈新安大族志〉与中国士绅阶层的发展(800~1600)》一文说:“徽州商业的意义是一个已经广泛研究的课题。徽州商人研究的逻辑出发点是: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陈野《论徽州商业资本的形成及其特色》、傅衣凌《明代徽州商人》、何炳棣《中国社会运动的概况》。”

80年代,我侧重于徽商对明清社会经济发展作用的研究,选择了徽商在江南的经商活动为重点,和它对促进商品经济发展和市场发育的意义

① 初刊《安徽史学通讯》1958年第5期。

②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续编),三联书店1960年出版。

③ 《徽商研究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